

《丹阳集》考辨

吕 玉 华

今存唐人选唐诗^①中,只有一部是以地域为标准的,即殷璠编纂的《丹阳集》。其他如《池阳境内诗》一卷、《江夏古今记咏》一卷、《宜阳集》六卷、《泉山秀句》三十卷等^②,今皆佚失。

一

据现在所知,唐人较早提及殷璠者,乃晚唐诗人吴融,他有《过丹阳》一诗(《全唐诗》卷六八四):

云阳县郭半郊垞,风雨萧条万古情。山带梁朝陵路断,水连刘尹宅基平。桂枝自折思前代(自注:李考功于此知贡举),藻鉴难逢耻后生(自注:殷文学于此集《英灵》)。遗事满怀兼满目,不堪孤棹艤荒城。

此诗中的“云阳”即“丹阳”。“丹阳,汉曲阿县,属会稽郡。又改名云阳,后复为曲阿。武德五年,于县置简州。八年,州废,县属润州。天宝元年,改为丹阳县,取汉郡名。”^③曲阿即古云阳,三国吴时复曲阿为云阳,晋时复云阳为曲阿。^④

因为诗中以“云阳”特指,所以题目《过丹阳》之“丹阳”应为县名,非郡名,则殷璠很可能为丹阳县(即曲阿)人。宋刻本《河岳英灵集》首页首行“河岳英灵集”五字下署“唐丹阳进士殷璠”。南宋时《嘉定镇江志》卷一八亦载:“殷璠,丹阳人,处士,有诗名。”^⑤元代所

编《至顺镇江志》卷一九同^⑥。

而殷璠所编《丹阳集》之“丹阳”当指润州郡，为隋文帝开皇十五年(595)始置，管辖延陵、永年、曲阿三县；大业三年(607)废润州为江都郡之延陵县；至唐，于武德三年(620)又在丹徒县置润州。武德九年时，润州管辖五县：丹徒、曲阿(天宝元年[742]更名为丹阳)、延陵、句容、白下(贞观九年[635]更名为江宁)。玄宗天宝元年正月，润州郡改为丹阳郡^⑦，肃宗乾元元年(758)复改为润州。此后，五代相沿“润州”之名，到宋政和三年(1113)升润州为镇江府。

据此，《丹阳集》的最后成编时间或许就在天宝元年到乾元元年之间，以郡名为集名。殷璠是丹阳县人，而《丹阳集》所指实为丹阳郡之范围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入选该集的诗人们共同点就是：占籍丹阳郡。

《新唐书》卷六〇《艺文志》四诗集类著录《包融诗》一卷，有长注：“融与储光羲均延陵人，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、缙氏主簿蔡隐丘、监察御史蔡希周、渭南尉蔡希寂、处士张彦雄、张潮、校书郎张晕、吏部常选周瑀、长洲尉谈戴，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、硖石主簿樊光、横阳主簿沈如筠，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、处士徐延寿，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、武进尉申堂构，十八人皆有诗名。殷璠汇次其诗，为《丹阳集》者。”

开元末润州辖六县，独金坛无人入选《丹阳集》，可能是此地没有合适人选。入选的诗人多在各地从宦，其共同点就是占籍润州。殷璠当与他们生同时，又为同郡人，故能就近了解而编纂其诗。

这些诗人或身处下僚，多为府县掌管文书簿籍之小官，或隐居不仕，但皆有可称道的诗才。盖如《唐音癸签》提及《丹阳集》，云其中诗人：“亦多盛唐间人，吴、杨所产也。殷氏叙其履历，但一二稍显。自余布衣冗秩，旁午篇中，岂此方当时遂无贵且文者耶？”^⑧

其实，当时此方有一“贵且文者”，即马怀素，两《唐书》有传，为开元时著名文士，官位较高，开元间仕至户部侍郎、秘书监，曾建议

修四部书录。卒年六十。他是当时最有文名的润州人。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时,储光羲作《秋庭贻马挺》序云:“扶风马挺,余之元伯也。舍人诸昆,知己之目,挺充郑乡之赋,予乃贻此诗。”诗云:“大君幸东岳,世哲扈时巡。……哲兄盛文史,出入驰高轨。”扶风为马氏显望。诗中的“舍人”、“世哲”、“哲兄”均指马怀素。此外,储光羲的诗里还多次提到“马舍人”,均指马怀素。马挺为其弟,开元中当已入中年,似居家在荥阳一带。而殷璠《丹阳集》收录马挺,不录马怀素,恐非偶然遗漏,或许是有意为名望不显者扬名,并不迎合时势。这一点从入选诗人的署衔上表现得很清楚。

陈尚君先生认为《丹阳集》的结集时间约在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之间,理由如下: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所述该集收各人官职,为结集时实任官,非终官。就十八人今可考知事迹来说,包融、孙处玄、沈如筠年岁较长,于武后末至中宗时已成名;申堂构至代宗永泰间尚在世,为卒年最迟者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,曲阿县于天宝元年改丹阳县,而《艺文志》仍称曲阿,知此集编成当在天宝元年(七四二)前。今知谈戴、申堂构、张晕分别为开元二十年、二十二年、二十三年登进士第,长洲尉、武进尉、校书郎均应为登第后所除。是此集成编当在开元二十三年(七三五)以后^⑨。

可是,集名《丹阳集》,显然是根据入选诗人共同的占籍来定的,而天宝元年一是曲阿县更名为丹阳^⑩,一是武德三年复置的润州郡亦改为丹阳。而且,郡名更改是在正月。这样,从天宝元年正月起,丹阳郡下辖延陵、丹阳(原曲阿)、句容、江宁、丹徒、金坛六县。而天宝元年前,此地仅汉代有“丹阳郡”之名(隋义宁元年,曾于义川置丹阳郡;唐武德元年改为丹州)。因此,在唐代,“丹阳”郡与“曲阿”县的官称不可能出现在同一时期,应是润州郡领曲阿县,丹阳郡领丹阳县。

但是,据今见《丹阳集》,其收诗目次明明为:延陵二人、曲阿九

人、句容三人、江宁二人、丹徒二人。若该集编成于天宝元年以前,考虑到现实,以《润州集》命名更妥。毕竟殷璠不太可能预知润州会改名丹阳。

既然该书已称《丹阳集》,则很可能是最后编成于润州改名丹阳之后,即天宝元年之后,此时虽然曲阿县亦名丹阳,但为了編集时文字说明方便,对县、郡有所区分,又因对该集来说,郡名更为重要,故县名仍沿袭旧称“曲阿”,还是比较合理的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的编者应该见到过《丹阳集》原貌,从而袭用其说法。

所以,《丹阳集》的最后成编是在天宝元年润州改名丹阳之后,乾元元年再次改名润州之前。当然,其具体编纂时间还要早一些。

二

下面来考察具体的编纂时间。

集中十八人,除延陵包融、储光羲外,均注明了官职。

包融生平不详,有二子包何、包佶。梁肃《秘书监包府君(笔者按:即包佶)集序》称“烈考集贤院学士、大理司直、赠秘书监讳融……实以文藻名扬于开元中”(《全唐文》卷五一八);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云“历大理司直……融与储光羲均延陵人”;《新唐书》卷一四九《刘晏传》附《包佶传》谓“佶字幼正,润州延陵人。父融,集贤院学士……与贺知章、张旭、张若虚有名当时,号吴中四士”;《国秀集》收包融诗,目录作“大理司直包融”。由以上诸书载,知包融仅历集贤院学士、大理司直二职。

又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《文苑中·贺知章传》云:“先是神龙中,知章与越州贺朝、万齐融、扬州张若虚、邢巨、湖州包融,俱以吴越之士,文词俊秀,名扬上京。”湖州乃今浙江省吴兴。

不过,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九《于休烈传》又说:“于休烈……自幼好学,善属文,与会稽贺朝、万齐融、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,齐名一时。”而《嘉定镇江志》卷十八包融条也写作:“包融,延陵人,历大理

寺直集贤院学士。”^⑩

综上所述,包融应是延陵人,湖州疑为郡望。

《旧唐书·贺知章传》亦提到:“融遇张九龄,引为怀州司户、集贤直学士。”开元十三年,从张九龄议始改“集仙殿”为“集贤殿”,并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。其中五品以上为学士,六品以下为直学士。但该年的学士据《职官分纪》卷十五引韦述《集贤纪注》所录^⑪,并无包融之名。因此张九龄荐包融当在此年后。又开元二十四年,张九龄出相。故包融任集贤院学士应在开元十三年之后、开元二十四年之前。大理司直似为包融终官,按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,大理司直为从六品。

据以上诸书,包融主要活动于神龙及开元中。若《丹阳集》编纂时,包融尚任职,则殷璠理应注明。又,如果《丹阳集》所标为各人终官,则亦应写明“大理司直包融”。而现在所见到的《丹阳集》,包融仅一名字。此时或许包融已下世,名望亦不显,故不再署任何职衔,仅作乡贤对待。亦适足证明《丹阳集》所注各人身份为編集时身份,这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之《包融诗》注的口气亦相一致。包融二子包佶、包何,在安史之乱后大历、贞元际始著名。《丹阳集》不录二子,为不及见。

储光羲开元十四年(726)进士及第,仕历数任县佐后,约于开元二十一年(733)辞官归乡,隐居延陵,后又入秦,隐于终南山,《终南幽居献苏侍郎》即作于此时。天宝六、七载间,再次出山任太祝^⑫。也就是说,从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六、七载间约十四、五年时间,储光羲无任何官职。

《丹阳集》的编纂也应在此间,因储光羲已进士及第,且曾为宦,虽隐居而非处士,故不署其职衔、身份。

今知谈戴、申堂构、张晕分别为开元二十年、二十二年、二十三年登进士第,长洲尉、武进尉、校书郎均应为登第后所除。是《丹阳集》成编当在开元二十三年以后。

又，句容人殷遥署衔为“忠王府仓曹参军”^⑭。殷遥的生平，可据储光羲《新丰作贻殷四校书》、《同王十三维哭殷遥》、王维《哭殷遥》、《送殷四葬》（收入《国秀集》）等诗，知其卒当在天宝三载前^⑮。按《旧唐书》卷十《肃宗纪》，肃宗于开元十五年始封忠王，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，立为皇太子。则忠王置府属在开元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，“忠王府仓曹参军”之任也应在此时。^⑯

现在可以断定，《丹阳集》结集时，除包融已卒、储光羲隐居外，其余诸人或薄宦或处上，从而，我们可以把《丹阳集》编纂时间锁定在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六年间，最后定名成编则在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间。

三

《吟窗杂录》卷四一《杂序》首录殷璠《〈丹阳集〉序》：

李都尉没后九百余载，其间词人不可胜数。建安末气骨弥高，太（笔者按：原作大）康中体调尤峻，元嘉筋骨仍在，永明规矩已失，梁、陈、周、隋，厥道全丧，盖时迁推变，俗异风革，信乎“人文化成天下”。

所录仅此，按照一般的顺序来看，接下去应该讲述唐代的诗风及其总体特点，然后转入对《丹阳集》的具体说明。可惜今已佚失。

从这简短的序文残篇里，我们能读出的信息是殷璠分别用气骨、体调、筋骨指称建安、太康、元嘉诗的特点，尤为推崇建安诗，斥责永明“规矩已失”，梁至隋为“厥道全丧”；持文学发展的眼光，认为时迁推变、俗异风革。玩味字义，则“规矩”与“道”内涵相似，能包括气骨、体调、筋骨等。

《丹阳集》有诗存世的十七人中，除储光羲外，共存诗五十四首又三十二句，相信有较大一部分曾收入《丹阳集》。而确知收入《丹阳集》之诗，共十九首又二十八句。十九首中有五古八首，五律七首，七律一首，五绝三首。三首五绝，有可能是从五古中节录出

来的。二十八句中，可推知十四句为五古零句，二句为七古，十句为五律，二句为七律。据此可知，该集收诗古体多于近体，五言超过七言^⑦。

今存的评语残文为：包融诗“情幽语奇，颇多剪刻”；孙处玄“善属文”；沈如筠“早岁驰声，白首一尉”；丁仙芝诗“婉丽清新，迥出凡俗，恨其文多质少”；殷遥诗“闲雅，善用声”；张彦雄诗“但贵〔潇〕洒，不尚绮密，至如‘云壑凝寒阴，岩泉激幽响’，亦非凡俗之所能至也”；储光羲诗“宏赡纵逸，务在直置”；蔡隐丘诗“体调高险，往往惊奇，虽乏绵密，殊多骨气”；张潮诗“委曲怨切，颇多悲凉”；蔡希周“词彩明媚，殊得风规”；张晕诗“巧用文字，务在规矩”；周瑀诗“窈窕鲜洁，务为奇巧。瑀诗曰：‘寒深包晚橘，风紧落垂杨。’又诗：‘孤山日暮青’，亦为清唱。”；蔡希寂“词句清迥，情理绵密”；谈戴诗“经典古雅”；徐延寿诗“婉变艳美”；申堂构“善叙事咏物，长于情理”；樊光“诗理周旋，词局妥贴”。

这些评语描述的基本上是诗本身的体制及语言特点，大略可分两类：

一是肯定其骨力体调，不同流俗。如储光羲诗“宏赡纵逸，务在直置”；张彦雄诗“但贵〔潇〕洒，不尚绮密……亦非凡俗之所能至也”；蔡隐丘诗“体调高险，往往惊奇，虽乏绵密，殊多骨气”。这类诗的特点是句式潇洒纵逸，不以意象的绵密叠加取胜，不以韵律的巧妙取胜，较为质朴。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一种特征。

如集中今存储光羲《田家杂兴》：

种桑百余树，种黍三十亩。衣食既有余，时时会亲友。
夏来菰米饭，秋至菊花酒。孺人喜逢迎，稚子解趋走。
日暮闲园里，团团荫榆柳。酩酊乘夜归，凉风吹户牖。
清浅望河汉，低昂看北斗。数瓮犹未开，明朝能饮否？

质朴无奇的乡村景物如在目前：桑、黍、菰米、菊花、榆、柳……四季轮回里，不变的是天上的河汉和农家热情待客的笑

脸,醅醅的人情滋味仿佛融在凉风里,轻轻地拂进人心。因为有菊花,有酒,更有不事雕琢的白描手法,全诗意境亦颇有渊明风味。

蔡希逸、蔡希周、蔡希寂为三兄弟,《全唐文》卷三六五蔡希综《法书论》云:“第四兄侯氏主簿希逸,第七兄洛阳尉希寂”并工书。清人宗廷辅以为“隐丘原名希逸”,唐人有以字行的习惯,而“隐丘”与“希寂”可以互训,或许蔡隐丘即蔡希逸。

据《新志》,则蔡隐丘为曲阿人,尝官侯氏主簿(《唐诗纪事》同)。元代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五:“蔡隐丘,善真行书,如临崖古柏,体劲节多……;吕搢谓其古质新意,自是一家。”从殷璠的评语中看出,蔡希周与蔡希寂的诗风相似,而蔡隐丘更有骨力。

另一类是语言婉约清丽,善用声色,多精心剪裁。如包融诗“情幽语奇,颇多剪刻”;孙处玄“善属文”;沈如筠“早岁驰声,白首一尉”;丁仙芝诗“婉丽清新,迥出凡俗,恨其文多质少”;谈戴诗“精典古雅”;殷遥诗“闲雅,善用声”;张潮诗“委曲怨切,颇多悲凉”;蔡希周“词彩明媚,殊得风规”;张晕诗“巧用文字,务在规矩”;周瑀诗“窈窕鲜洁,务为奇巧。……亦为清唱”;蔡希寂“词句清迥,情理绵密”;徐延寿诗“婉变艳美”;申堂构“善叙事咏物,长于情理”;樊光“诗理周旋,词句妥贴”。不过,这类诗的重心并不表现于重视声律(仅对殷遥提及了“善用声”),更表现在造词遣句上。

后一类的人数显然比前一类多,也能表明润州诗人的总体基本特点,即诗风偏于婉约清新,其自然处有盛唐气韵。

如周瑀《潘司马别业》:

门对青山近,汀牵绿草长。寒深包晚橘,风紧落垂杨。

湖畔闻渔唱,天边数雁行。萧然有高士,清思满书堂。

诗中物色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,围绕一个“清”字,安排了青山、绿水、晚橘、垂杨、雁行等冷色调的景物,又特地点明其特质是“寒”,一声渔唱使画面更加高远。在这种种铺垫之后,方有高士出场,其“萧然”气质正合全诗基调。景归于人,而自然有“清思”。这

一首小诗的语言确实足够“窈窕”。

又张潮,生平不详。《唐诗纪事》说他是大历中处士,但《丹阳集》已收他的作品,可见他成名很早。其诗今存五首,都是取闺阁为题材,有浓郁的水乡情调。如《江南行》一绝:“茨菰叶烂别西湾,莲子花开犹未还。妾梦不离江上水,人传郎在凤凰山。”风调明快,很有民歌情味。《丹阳集》有其《江风行》一首,《乐府诗集》卷七二题作《长干行》,曾被误作李白、李益诗,属传统的思妇题材,但使用叙事手法,语句和情思均摇曳多姿,谈不上“悲凉”,倒是颇“委曲怨切”。

今存《丹阳集》中,殷遥的两首诗皆五律,殷璠评为“闲雅,善用声”。《全唐诗》卷一一四存殷遥诗五首,也都是五律。也许律诗与“用声”的关系更密切,而我们从有限的殷遥诗还较难看出他“善用声”的特点。《友人山亭》、《山行》意境并不是很脱俗,亦缺乏耐人咀嚼的醇美,但语词尚清丽。试读《山行》:

寂历青山晓,山行趣不稀。野花成子落,江燕引雏飞。

暗草薰苔径,晴杨扫石矶。俗人犹语此,余亦转忘归。

张晕今存诗二首,一为五律《游栖霞寺》,一为五绝《绝句》(《丹阳集》录入),有山水诗派风格。沈如筠,《嘉泰吴兴志》卷十六云:“又有沈如筠,有《正声集》诗三百首,有曰‘渔阳燕旧都,美人花不如’,吏部侍郎卢藏用常讽诵之。”^⑮

处士余延寿^⑯诗今存三首,分别出《搜玉小集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。储光羲有《贻余处士》诗,《唐诗纪事》作开元间处士,^⑰当可信。殷璠评为:“延寿诗婉变艳美。”今《丹阳集》所辑之《折杨柳》即闺怨题材,情思绮丽。

因本集存诗中古体多于近体,五言超过七言,可推断当时丹阳诗人的创作以五古为主,殷璠对五言古体也颇为欣赏,在这一点上,《河岳英灵集》对《丹阳集》又有继承和发展。

《丹阳集》中诗人主要活动于开天之际,上起武后末,下至大历年间,包融、储光羲、殷遥等与王维、孟浩然等山水派大家有密切交

往。孟浩然有《宴包二融宅》诗,曰:“闲居枕清洛,左右接大野。门庭无杂宾,车辙多长者。是时方盛夏,风物自潇洒。五日休沐归,相携竹林下。开襟成欢趣,对酒不能罢。烟暝栖鸟迷,余将归白社。”是诗展现了典型的隐者生活,也可见包融与孟浩然欣欣同调。包融有二子包何、包佶,均善诗,世称“二包”。包何曾师事孟浩然,得授格法(据《唐才子传》)。

储光羲交游广泛,集中四次提及王维,且有唱和之作,与綦毋潜为同年进士,集中有《酬綦毋校书梦若耶溪见赠之作》;綦毋潜亦有《储十二还庄城》、《冬夜寓居寄储太祝》;孟浩然有《同储十二洛阳知中作》;储光羲与裴迪、祖咏亦有交情,而天宝之际,与杜甫、岑参、薛据同登慈恩寺,更留下壮伟诗篇,成为千古佳话。

殷遥仕宦不达,身后极为寥落,止遗一女。故王维有《哭殷遥》、《送殷四葬》(均收入《国秀集》),诗云:“念君等为死,万事伤人情。慈母未及葬,一女才十龄。泱泱寒郊外,萧条闻哭声。”储光羲亦有《同王十三维哭殷遥》,云:“筮仕苦贫贱,为客少田园。茅茨俯苫盖,双殡两楹间。时闻孤女号,迴出陌与阡。”皆体现出至交情意。

以上事例说明当时的丹阳诗人并非孤立闭守的地方小群体,他们的足迹较广,沾溉了时代风气。又吴地从东晋南朝时起,就是风流渊薮,丹阳诗人生长于斯,也培养出独特的地域气质。多方面结合,而形成《丹阳集》吉光片羽中呈现出的清新诗风。

注:

①参见傅璇琮编著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,西安: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5。

②据明·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,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。

③《旧唐书》卷四十,《志》第二十地理三,北京:中华书局,页1854。

④参见《嘉定镇江志》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(3)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,页2317。

⑤《宋元方志丛刊》(3),页2525。

⑥“隐逸”之“土著”条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(3),页1869。

⑦《旧唐书》未言“正月”,此处参见傅璇琮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(一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,页212。

⑧卷二十八·谈丛四,页246。

⑨参见陈尚君《殷璠〈丹阳集〉辑考》,《唐代文学论丛》总第八辑,页169-190;及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之《丹阳集·前记》,页77-79。

⑩参见唐·李吉甫撰、贺次君点校《元和郡县图志》(下),中华书局,1983,页591-592。

⑪《宋元方志丛刊》(3),页2525。

⑫参见宋·孙逢吉撰《职官分纪》卷十五,中华书局,1988,页376。

⑬《唐才子传校笺》(一),页211-223。

⑭《嘉定镇江志》卷十八所录为“殷遥,润州人,官王府记室参军”,页2525。

⑮陈铁民:《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》,《文史》第十二辑,中华书局,1981,页195-210。

⑯因太子之立,乃国家大事,殷璠不可能不知。录殷遥诗时,“忠王府”必定仍设。也许因为初编与定名不同时,对正文最后亦未再作校正,故今见殷遥仍署“忠王府仓曹参军”。

⑰参见陈尚君《殷璠〈丹阳集〉辑考》。

⑱宋·谈铨撰:《嘉泰吴兴志》卷十六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(5),页4821。

⑲从陈尚君先生判断,为“余延寿”,非“徐延寿”,见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,页97。

⑳宋·计有功撰:《唐诗纪事》卷十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,页257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华书局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